

# 哥特风格

## 建筑 雕塑 绘画

罗尔夫·托曼 主编  
阿希姆·贝德诺尔茨 摄影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译

# 哥特风格

## 建筑·雕塑·绘画



# 哥特风格

## 建筑·雕塑·绘画

罗尔夫·托曼 (Rolf Toman) 主编

阿希姆·贝德诺尔茨 (Achim Bednorz) 摄影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译

丛书翻译：朱颖、许佑顶、秦小林、魏永幸、金旭伟、王锡根、苏玲梅、张桓、张红英、刘彦琳、祝捷、白雪、毛晓兵、林尧璋、孙德秀、俞继涛、徐德彪、欧眉、殷峻、刘新南、张兴艳、张露、刘娴、周泽刚、毛灵、彭莹、周毅、秦小延、胡仕贵、周宇、王朝阳、王平、蔡涤泉

封面:

科隆大教堂 (Cologne Cathedral), 始建于1248年

唱诗堂, 落成于1322年

摄影: 阿希姆·贝德诺尔茨

封底:

圣彼得与圣保罗大教堂, 瑙姆堡

埃克哈德雕像 (Ekkehard), 捐助人捐赠

摄影: 阿希姆·贝德诺尔茨

卷首插图:

威尔士 (Wells Cathedral) 大教堂

通向宗教活动会议厅的楼梯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1-4635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哥特风格: 建筑, 雕塑, 绘画 / (德) 托曼(Toman,R.) 主编;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译. --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2.6

书名原文: Gothic:Architecture,Sculpture,  
Painting

ISBN 978-7-113-14006-9

I. ①哥… II. ①托… ②中… III. ①哥特艺术: 建筑艺术—世界  
②雕塑评论—哥特艺术—世界③绘画风格—哥特艺术—世界  
IV. ①TU-861②J309.9③J2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8859号

Gothic:Architecture,Sculpture,Painting,4687

ISBN 978-3-8331-5148-4

©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2011

© h.f.ullmann publishing GmbH

Editing and producing: Rolf Toman, Esperaza, Birgit Beyer,

Cologne, Barbara Borngässer, Paris

Photography: Achim Bednorz, Cologne

Picture Research: Barbara Linz, Sylvia Mager,Cologne

Cover Design: Werkstatt München

Diagrams: Pablo de la Riestra, Marbury

书 名: 哥特风格——建筑, 雕塑, 绘画

著 者: (德) 罗尔夫·托曼 (Rolf Toman)

译 者: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策划编辑: 石建英 杨新阳 凌遵斌

责任编辑: 王菁 电话: 010-83545974-807

责任印制: 郭向伟

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080mm 1/16

印 张: 32.5 字数: 1196千

书 号: ISBN 978-7-113-14006-9

定 价: 400.00元

# 目 录

|              |                     |     |
|--------------|---------------------|-----|
| 罗尔夫·托曼       | 绪论                  | 7   |
| 巴勃罗·德拉·列斯特拉  | 哥特式建筑中的宗教与世俗元素      | 18  |
| 布鲁诺·克莱因      | 法国及其邻国哥特式建筑的起源      | 28  |
| 芭芭拉·博恩格赛尔    | 法国南部地区的异教流派卡特里派     | 116 |
| 乌特·恩格尔       | 英国的哥特式建筑            | 118 |
| 克里斯琴·弗赖冈     | 中世纪的建筑方法            | 154 |
| 彼得·库尔曼       | 法国和荷兰的晚期哥特式建筑       | 156 |
| 克里斯琴·弗赖冈     | 阿维尼翁的教皇宫殿           | 188 |
| 巴勃罗·德拉·列斯特拉  | “德国土地”上的哥特式建筑       | 190 |
| 巴勃罗·德拉·列斯特拉  | 斯堪的纳维亚和中东欧的哥特式建筑    | 236 |
| 埃伦弗里德·克卢克特   | 中世纪的城堡、骑士和宫廷权贵爱情观   | 240 |
| 芭芭拉·博恩格赛尔    | 意大利的哥特式建筑           | 242 |
| 芭芭拉·博恩格赛尔    | 佛罗伦萨和锡耶纳：公共建筑竞争     | 252 |
| 阿利克·麦克莱恩     | 中世纪城市               | 262 |
| 芭芭拉·博恩格赛尔    |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晚期哥特式建筑     | 266 |
| 乌韦·格泽        | 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英国的哥特式雕塑  | 300 |
| 雷吉内·阿维格      |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哥特式雕塑       | 372 |
| 埃伦弗里德·克卢克特   | 哥特式绘画艺术             | 386 |
| 埃伦弗里德·克卢克特   | 主观性、美观及自然：中世纪艺术理论   | 394 |
| 埃伦弗里德·克卢克特   | 1400年左右绘画艺术中的建筑主题   | 402 |
| 埃伦弗里德·克卢克特   | 汉斯·梅姆林作品的叙事主题       | 420 |
| 埃伦弗里德·克卢克特   | 希罗尼穆斯·博斯作品中的天堂与地狱景象 | 424 |
| 埃伦弗里德·克卢克特   | 金色、光线与色彩：康拉德·维茨     | 438 |
| 埃伦弗里德·克卢克特   | 景象描绘与视觉感知           | 439 |
| 埃伦弗里德·克卢克特   | 通往个人主义之路            | 454 |
| 布丽吉特·库尔曼·施瓦茨 | 哥特式彩色玻璃             | 468 |
| 埃伦弗里·德克卢克特   | 中世纪的学术和艺术           | 484 |
| 哈拉尔德·沃尔特·冯   | 哥特式黄金制品             | 486 |
|              | 图片来源                | 5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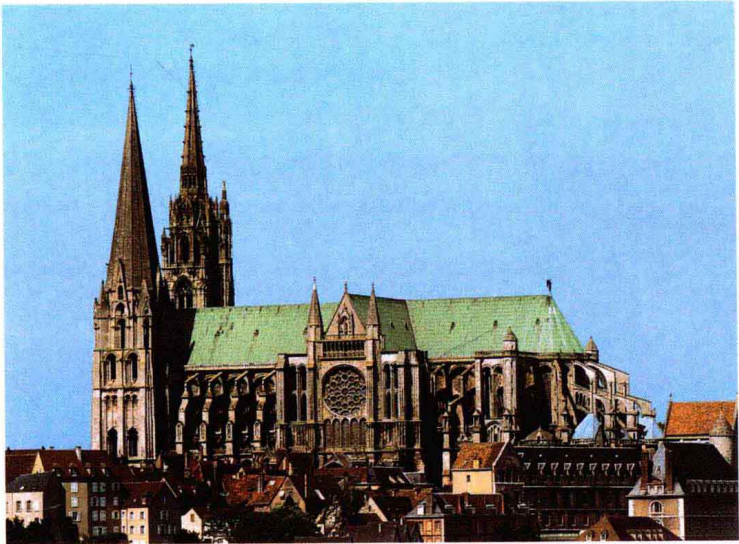
罗尔夫·托曼

绪论

“在距离沙特尔（Chartres）30千米开外的地方，也就是说还要走上好几个钟头的位置，人们便会理解为什么这座城市单凭城中天主教堂及其两座尖塔的雄伟壮观就使这一地区闻名遐迩。沙特尔市大教堂是一座城市标志性教堂。正是由于这座大教堂，沙特尔在整个中世纪得以繁荣兴旺。如今，它依然保留着沙特尔的昔日风采。且问，它有怎样的昔日风采呢？这里曾是一个与教堂共风雨、共兴衰的世界。在这里，房屋围着教堂簇拥而立，街道以教堂为中心辐射延伸；在这里，人们把目光从田间、牧场或者村庄转向了这座大教堂……在它长达几个世纪的修建和缓慢兴起的历程中，无论是住在简陋小屋的普通农民，还是住在华贵城堡的达官贵人，他们都过着同样的教堂生活，有着同样的体会……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参与到共同的教堂生活中来。如果意识不到在外面，或近或远，即使有属于自己的财富，在夜晚却都就免不了因贫困而感到绝望。”

这一段话摘自意大利作家埃利奥·维托里尼（Elio Vittorini）的《公开日记》（*Open Diary*）（1929—1959年）。在这一段评论中，作者表达了人们普遍渴望一个理想的世界，一个完整而又含蓄的世界。同样，19世纪的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弗朗西·雷内·夏多布里昂（François René Chateaubriand）、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卡尔·弗里德里希·辛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等人看到哥特式教堂时也被深深打动，他们洞察到了哥特式教堂宽阔高大的空间所蕴涵的灵性与超脱，直到今天人们对此仍有同感。20世纪著名的哥特式建筑学者汉斯·扬岑（Hans Jantzen）〔本文简介引用的维多里尼感言就摘自他的《西方哥特式建筑》（*The Gothic of the West*）一书〕显然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至今仍秉承部分浪漫主义传统。他认为，哥特式建筑的显著特点是“用丧失了重量和直冲云霄的无形东西”以及“半透明结构”和“象征无限空间的空间”使周围自然环境中实实在在的物质消失于无形。哥特式建筑的主题一直是超验的。

哥特式大教堂的这种特色对于汉斯·泽德尔迈尔来说同样十分重要。这位学者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表了其著名的作品《大教堂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the Cathedral*）（1950年）。泽德尔迈尔将代表欧洲艺术最高水平的教堂视作复杂而多层面的作品，试图用大



教堂的闪亮光芒一扫他所在时代的阴霾。正如扬岑已“发现”的半透明墙壁结构，泽德尔迈尔同样将他的目光向上投向穹顶，确定了他所谓的哥特式大教堂“华盖系统”（由细长的立柱支撑的穹顶看似华盖）。但除了结构分析和形而上的解释外，泽德尔迈尔还增加了一项内容：时间与哲学。他所撰写的大教堂著作与其极端保守的文艺批判著作——《危机中的艺术：遗失的中心》（*Art in Crisis: The Lost Center*，1957年，德语原版发表于1948年）——在这一方面都是一脉相承的。书中所表现的种族观念和思想基础含糊不清且十分明显。

在德国，关于哥特式风格保守的文艺批判与过于崇拜之间的密切关系源远流长。哥特式风格以这种方式融入思想意识，与人们长期相信哥特式风格（而非罗马式风格）才是真正的日耳曼风格密切相关。在这一错误基础上进行的最终分析中，我们发现哥特式概念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理论中被冒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理论认为，就本质而言，中世纪艺术总体上属于日耳曼风格或哥特式风格，意大利的新文艺复兴艺术也最终从中世纪艺术解放出来。一直到1800年左右，哥特式与日耳曼画上了等号，成为了欧洲文化的传统（*topos*），并且成为一种几乎无人质疑的文化传统。由此，在德国引起了对哥特式作品的全国性热潮，人们认为透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到先辈们的最伟大成就……但后来，刚刚出现的一门学科“艺术史”迅速确认了哥特式，尤其是哥特式大教堂，其实是德国当时的劲敌法国的原创成果。这一痛苦的“确认”导致人们评价德国中世纪（German Middle Ages）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舒茨（Schütz）和米勒（Müll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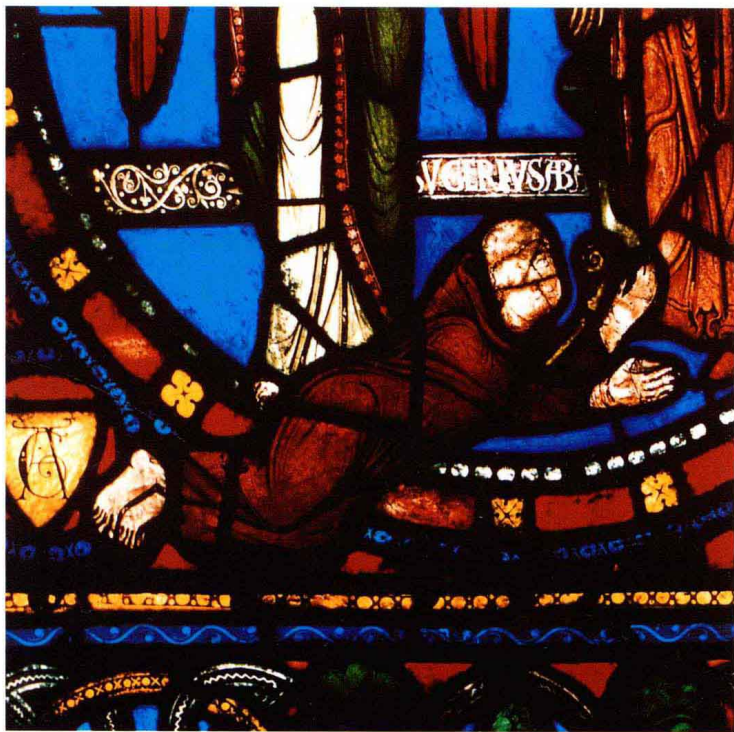
这一错觉源于民族优越性思想，而这种错误即使是某些艺术史学家也无法避免的。对哥特式的民族起源的这一错误认识是何等的根深蒂固，着实令人吃惊，值得我们铭记在心。对于此类观点，甚至在泽德尔迈尔的教堂著作中也可体会到，只不过比德国纳粹出版物的观点更委婉一些，措辞似乎也更文明一点罢了。

泽德尔迈尔对哥特式大教堂本源的研究总结告诉我们：“就大教堂的整个结构而言，北部日耳曼〔北欧（Nordic）〕元素提供了结构部件，好似骨架；所谓的哥特式（西欧）元素提供了‘诗意’；地中海（南欧）元素提供了全面而人性的元素……从历史上讲，这些元素并非在大教堂修建时同时出现，而是以上述顺序出现……第三个元素从一开始就发挥了作用，但它最初与其他元素叠加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不大。只有到1180年后第三个元素（地中海元素）才活跃起来，进而确立了大教堂的‘古典阶段’，但自1250年开始，它又受到了坚决压制。因此，‘古典’大教堂成功地融合了三个民族最优秀的特点。就艺术而言，它创造了‘法国性’；而就这种充分的融合而言，它具有最高意义的欧洲性。”今天，这种从生物、民族和种族角度开展的研究，或者为了解释“大教堂的实质”所作的“人类心理”研究，正如威廉·沃林格（Wilhelm Worringer）对其的命名和做法一样，已被看作是过时了的做法。

我们试图理解中世纪艺术和生活的主要障碍在于我们很难让自己置身当时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世界中，而理解上的决定性障碍体现于中世纪基督教。中世纪基督教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决定了那个时期的思想和情感。就这一方面而言，今天的我们比浪漫主义时代的人更远离中世纪生活。泽德尔迈尔在其1976年再版的有关天主教堂书籍的编后语中提到了这一困难。他认为，“我们必须以中世纪人的眼光来审视大教堂”这一做法完全没必要，因为这些人必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相反，泽德尔迈尔建议“从建造者、叙热（Suger）及他的建筑师的角度来审视大教堂。”这才是一项明确的工作，由此我们才可能找到方法完成这项工作。即使我们不能完全苟同泽德尔迈尔的乐观看法，但我们在此还是采用了这一方法；我们可以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哥特式的起源和圣丹尼斯的院长叙热（Abbot Suger of St.Denis）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对于这一点，至少艺术史学家的看法是一致的。

### 圣丹尼斯男修道院院长叙热：哥特式的起源

哥特式风格起源于法国，即于1140年左右诞生在名叫“法兰西（Francia）”的小王国之中。当时，法兰西的疆土包括从贡比涅（Compiègne）到布尔日的区域，并以皇城巴黎作为其中心。相比今



日之法国，当时的疆土简直微不足道，但这里却迅速地相继建造了许多最宏伟的新哥特式大教堂。那时，法兰西国王尽管声望不小，但是仍然势单力薄。他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亚于诺曼底（Normandy）公爵（即同时期的英格兰国王），也赶不上西南和东部邻国公爵和香槟省（Champagne）的伯爵。

然而，法兰西国王与其他封建主的区别以及他拥有较高威望的原因在于他在加冕礼上被涂抹了圣油，从而被赋予了神性。

这一潜在的东西便是12世纪法兰西的领军人物之一圣丹尼斯的叙热（1081—1151年）懂得如何利用的东西。虽然出身卑微，叙热却是路易六世的发小，他们一起在圣丹尼斯修道院接受修道士教育；之后，他是路易六世（1108—1137年）和路易七世（1137—1180年）的亲信，为其出谋划策并担任外交官。路易七世及其皇后于1147年到1149年参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Second Crusade）时，任命叙热为摄政王，而叙热亦不负重托，表现十分出色。叙热的传记作者修道士威廉姆斯（Willelmus）曾记录到：从那时起，叙热就被称为“国父”，他将加强法兰西的君主制度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由于意识到法兰西国王的世俗权利受限很大，所以，他明白提高君主的精神威望至关重要，这也成为叙热的奋斗目标。

圣·贝尔纳在其修道院讲经  
摘自《艾蒂安武士时间之书》(Book of  
Hours of Etienne Chevalier)  
约1450—1460年  
法国尚蒂伊的孔德美术馆 (Musée Condé)

1122年叙热就任圣丹尼斯男修道院院长时，他一边开展自己的其他工作，一边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梦想，即翻修长期无人问津的教堂，借此恢复修道院原先的声望。这座教堂也是梅罗文加王朝 (Merovingian) 的皇家安葬之所，在卡洛琳王朝 (Carolingians) 时期曾享有盛名，是该王国最重要的教堂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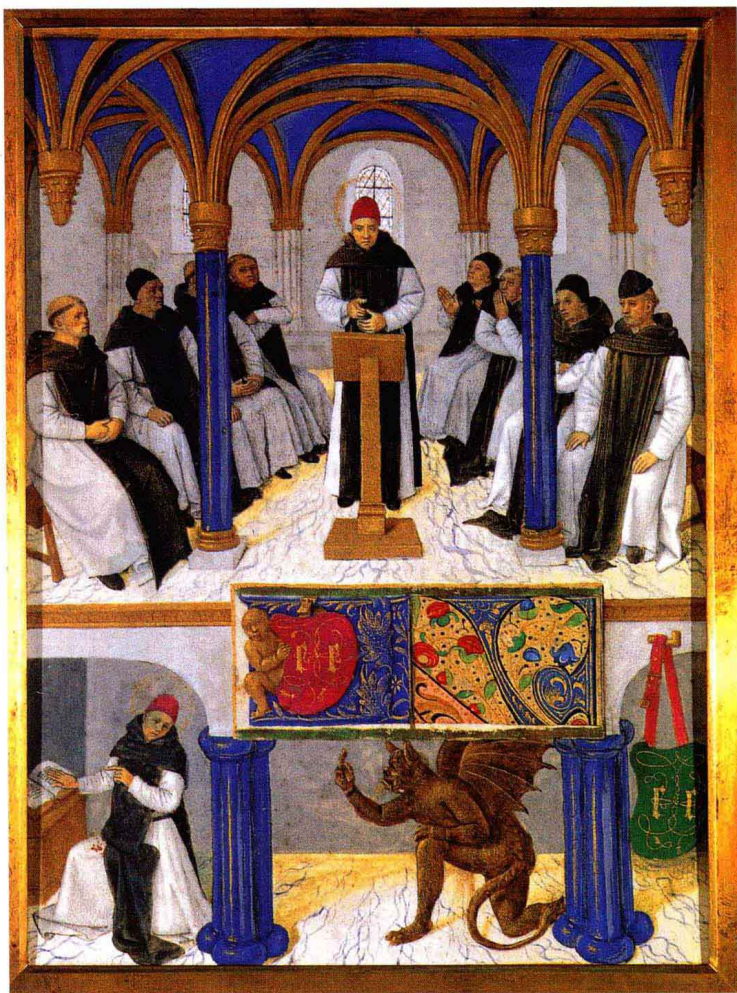
也就是在这儿，在这个历史重镇，院长叙热通过他对修道院的贡献 (1137—1144年) 而成为教堂建筑新空间秩序的开创者。他和他的建筑师们在采用其他革新措施的同时，首次将勃艮第的建筑元素 (尖券) 和诺曼底的建筑元素 (肋架拱顶) 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他成为实际上的“哥特式的创始人”。

此举在艺术史上意义重大，所以哥特式不是诞生在政治真空中的，它是宗教、美学和政治动机的产物。关于这一点，本书的第一部分《法国哥特式建筑的起源》(见28~115页) 将进行详细介绍。布鲁诺·克莱因 (Bruno Klein) 列举了使叙热及其建筑师有能够创造新教堂建筑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技术条件。这种新教堂建筑是一种具有“心灵之光的建筑”，它将朝拜者的目光“从物质提升到非物质”。不久后，这又使富有革新精神的建筑师能够拓展叙热的宗教建筑新理念，从而创造出伟大的哥特式大教堂。

1180年到1270年 (哥特式风格鼎盛时期结束) 期间，仅在法国就建造了约80座大教堂。这仅仅是指城市主教建筑，并未包括众多其他形式的教堂，比如修道院、牧师会与教区教堂。正是在这些大教堂和主教教堂中，我们找到了新哥特式建筑特有的表现形式。大教堂首先出现在法兰西国王领地 (以巴黎为中心的皇室领地)，随后出现在更多地区，它是威望与权力显而易见的展示。12世纪晚期到13世纪，教堂的扩大与法兰西君主的扩张政策齐头并进。实际上，某些史学家认为哥特式大教堂的修建是欧洲中世纪时期法兰西地位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法兰西的地位上升总的来说发生于国王菲利普·奥古斯特 (Philippe Auguste) (菲利普二世，1180—1223年) 在位期间，又在路易九世 (圣·路易斯，1226—1270年) 统治时期得以进一步巩固。从13世纪20年代起，欧洲的其他国家 (英国早在1170年前后) 开始吸纳“法兰西风格”，大都因为该风格代表了最新的建筑技术，但这不是唯一原因。至此，哥特建筑成为一种欧洲风格。

### 院长叙热和圣·贝尔纳 (St. Bernard)

史学家埃尔温·帕诺夫斯基 (Erwin Panofsky) 曾撰写了《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Gothic Architecture and Scholasticism) (1951



年)，对中世纪艺术、哲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引人入胜的研究。他对圣丹尼斯的叙热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在其大部分作品中，帕诺夫斯基都是以思想文化史作为艺术史的基础。这便是他解读院长叙热的方法论。

同样，在其有关叙热和圣丹尼斯的著作中，他把圣丹尼斯修道院院长生动地描绘成一个富有个性的人：“一位强烈的爱国者，一位高尚的修道院院长；虽有点夸耀和喜欢讲排场，但处理实际事务时是完全务实的，并且个人习惯良好；勤劳、友善、性格温和、见多识广、自负、诙谐幽默、活力四射。”可以认为，叙热肯定会享受生活，尤其对美好事物的闪光点与奇妙之处十分敏感。

上述各个方面，特别是他对漂亮物件的喜爱，使叙热明显有别于同时代另一位主要人物——克莱韦尔的圣·贝尔纳 (St. 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年)。这位伟大的西多会 (Cistercian) 院长是12世纪最雄辩的辩论家和最有权势、最有影响力的修道士。他认为修道士生活就是恪守信条的生活，而在个人舒适、饮食和睡眠等物质条件方面，人应当竭力克己。他具有满腔热情传教精神，斗志昂扬地投身于修行和礼拜活动。在他看来，各种宗教态度要么不够严格，要么疏于对基本教条的重视。贝尔纳还极其强烈地反对神学异教。然而，

即使是院长叙热，虽然肯定赞同戒律和节制，但也坚决反对屈从与禁欲，即“苦行僧式的美德”。然而，他无法漠视圣·贝尔纳的观点，因为圣·贝尔纳对罗马教皇有巨大影响。当然，圣·贝尔纳肯定不会放过有一段时期，即那一段时期在圣丹尼斯发生了与法兰西君主密切相关但却事与愿违的事情：“没有怀疑或伪装，他们将属于恺撒的归还恺撒，却没有同样自觉地将属于上帝的归还给上帝。”

无可否认，在1127年，即叙热担任院长的第六年，贝尔纳曾恭祝这位更世俗的同行成功“改革”圣丹尼斯修道院。然而，正如帕诺夫斯基所评论的，“本次‘改革’绝非削弱修道院的政治重要性，而是赋予其独立性和威望并使之繁荣，从而有助于叙热加强修道院与皇室的传统关系，并使关系正常化。”与他通常对那些不符合他苛刻标准的修道院表现的态度相比，是什么使圣·贝尔纳对圣丹尼斯的情况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呢？与他通常对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人表现的态度相比，是什么让他对待院长叙热又那么心慈手软呢？帕诺夫斯基推断这两位潜在对手在利益上彼此心照不宣：“意识到他们彼此为敌可能造成两败俱伤——一位是皇室的参谋，一位是罗马教廷（Holy See）的导师以及欧洲最伟大的精神力量；他们决定成为朋友。”

院长叙热与圣·贝尔纳之间的对立，从圣丹尼斯修道院的修缮特点也可可见一斑。院长叙热喜欢宗教画，喜爱各种教堂装饰，钟爱金子，珐琅和宝石。实际上他喜欢各种花里胡哨的东西，尤其是对彩色玻璃窗情有独钟。圣·贝尔纳则相反，他谴责这种装饰。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接受这种装饰的魅力，而是因为他认为这类东西会扰乱人们虔诚的思想，而无法专心祈祷和冥想。鉴于12世纪和13世纪西多会修道院和教堂在欧洲遍地开花，这意味着建造者不得不遵循由圣·贝尔纳的朴拙美学引发的许多条条框框。尽管如此，日益壮大的西多会对哥特式风格在整个欧洲传播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西多会接受哥特式建筑原理的技术进步，且西多会本身一贯具有创新精神，例如，为修建于偏远山沟的修道院开发的水利工程技术。

## 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

为了反驳中世纪时期的人缺乏鲜明个性这一观点，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纵观整个中世纪文化，简略地审视另一位与院长叙热同时期的人物。这个人与圣·贝尔纳同样有矛盾，实际上他们俩发生过直接冲突。他就是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1079—1142年）。

约瑟夫·皮珀（Josef Pieper）的著作《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生动地介绍了中世纪哲学。在该著作中，他向我们简单介绍了这位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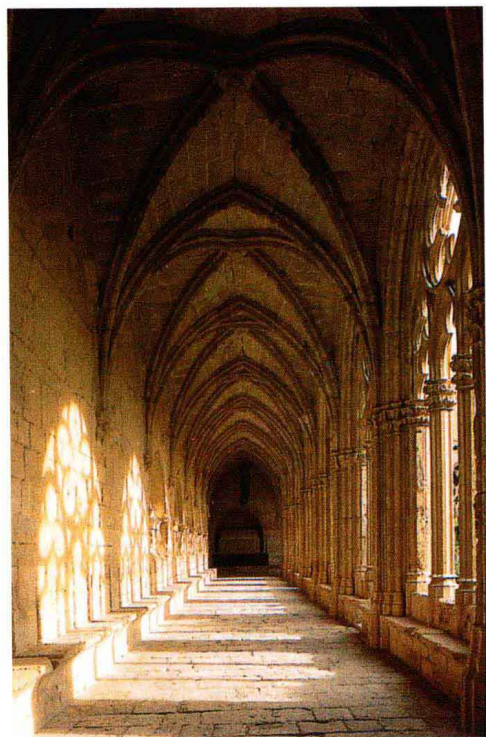
者的情况：

“彼得·阿伯拉尔到著名的洛色林（Roscelin）哲学学院上学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小男孩。20岁时，他就只身前往巴黎。两三年学业完成后，他自己创办了巴黎郊区的第一家哲学学院。29岁时，他的学院从郊区迁往巴黎市区并在今天的大学校园落成，标志着建办这所学院的成功。1115年，他成为圣母院（Notre Dame）教堂学校的院长，那年他35岁。不久后，他认识了埃洛伊兹（Héloïse）。

阿伯拉尔曾在自传《逆境中我的故事》（Story of My Adversities）〔又名：《塔特姆受难记》（*Historia calamitatum*）〕中讲述他如何出于情欲而非爱情，开始引诱了这个女孩。她也是他的学生。但当埃洛伊兹怀有他的孩子后，他们便秘密结婚了。”结果，埃洛伊兹的监护人对阿伯拉尔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将他痛打之后再将其阉割。这位著名而自信的教授被迫沦落到修道院避难。圣丹尼斯接纳了他。然而，这个著名的爱情故事并未就此结束，不过本文在此无法再讲下去。埃洛伊兹后来也住进了女修道院，但我们从他们的往来书信中了解到，这一对恋人在余生中一直保持着深厚的精神友谊。

通过阿伯拉尔，我们了解了一类新型学者、专业思想家或知识分子的早期代表。在12世纪，他公开支持城镇的复兴，最初担任过学校校长；后来到了13世纪，则担任过大学教授。意大利学者乔尼瓦·桑廷（Giovanni Santini）在其对摩德纳大学（University of Modena，建于12世纪末，意大利最早的大学之一）早期历史的研究中曾写道：“‘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新成员的诞生，预示着城市劳动力的分化。同样，大学机构的兴起预示着公共文化圈的形成。在公共文化圈，出现了这些新型‘知识型大教堂’，它们不断繁荣发展，并且相互间能够自由地开展辩论。”

巴黎是活跃的哲学和神学辩论中心，阿伯拉尔对其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中世纪的学者找到了磨砺他们的思想武器的充分机会。在关于宇宙的长期辩论中，阿伯拉尔是他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代言人。辩论的主题之一就是中世纪哲学。他凭其专著《是与否》（*Sic et non*）跻身于经院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并与约翰·斯库斯特·埃里杰纳（John Scotus Erigena，9世纪）、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兰弗朗克（Lanfranc）和安塞尔姆（Anselm）（均为11世纪）齐名。中世纪哲学和神学的思维与阐释之主要形式——经院哲学，通过冗长的论证和反证阐释（《是与否》）得出若干结论，最后由这位大师“定夺”。因此，阿伯拉尔是鼎盛经院哲学晚期“思想性大教堂”的奠基人之一。与院长叙热一样，阿伯拉尔通过重建其教堂成为了哥特式教堂修建的



发起人之一。正如我们前文已提到的帕诺夫斯基的《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或许我们也应该在此指出，有时这样的比较可能做得实在太草率，往往经不起仔细推敲。

阿伯拉尔的思想具有将逻辑学独立于哲学学科的显著特点，我们可根据其批判性和反教条主义倾向将其理解为中世纪启蒙运动的早期尝试。

这种思想通常表现为对人的关注多于对神的关注。举个例子来说，就道德问题而言，他强调，若动机不是邪恶的，则无所谓罪恶。凭良心做事时，我们有可能犯错，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而被视为有罪；因为我们的行为是善意的。

当时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信仰和理性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阿伯拉尔俨然采取了一副非常进步的姿态，认为只有公正的学术看法才应该确定信仰。换句话说，阿伯拉尔是早期城市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信仰与基督教的信仰是一致的，但他的思想开放，喜欢寻根问底。

## 信仰对理性的支配

然而，在一些人的眼里，巴黎犹如现代的巴比伦，一座骄奢淫逸与文化自豪并存的城市。阿伯拉尔最可畏的对手圣·贝尔纳向巴黎的

教师和学生发出呼唤：“逃离这座巴比伦，快逃吧，拯救你们的灵魂。所有人都可投奔各个庇护城，在那里你们能忏悔过去，过着当下的体面生活，并安心地等待未来[即，住进修道院]。你们会从森林中感悟到比书本更多的东西。树林和岩石教给你们的内容也会远远多于任何大师的讲授。”

圣·贝尔纳在这里表达了一种与阿伯拉尔完全相反的态度。这位站在基督教前沿的西多会院长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姿态。

如雅克·勒戈夫（Jacques Le Goff）所记载：“那个乡下人依然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战士，他理解不了城市知识分子。他认为只有一种做法可以对抗异教徒或者没有信仰的人：即暴力。作为十字军武力东征的拥护者，他不相信文化远征。当修道院院长彼得尊者（Peter the Venerable）〔克鲁尼（Cluny）修道院的最后一位杰出院长，死于1155年〕要求他读一下《古兰经》（Koran）译本，以便书面答复穆罕默德（Mohammed），贝尔纳根本不予理睬……这位宗教领袖过着避世隐居的生活，但随时准备与他认为危险的革新作战。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基本统领了信奉基督教的西欧。那时，他向罗马教皇下达他的命令，赞同军事修士会，梦想创造一支西部骑兵——基督的部队；他是一位超时代的伟大宗教法庭审判官。”



圣·贝尔纳曾用上文所引用的话语愤怒地责难“假导师”阿伯拉尔。阿伯拉尔从罗马哲学中感受到了基督精神，所以他将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视为基督教出现之前的基督徒。贝尔纳对此并不信服：“把柏拉图说成基督徒，只能说明你自己就是一个异教徒。”

另一方面，阿伯拉尔也随时准备挑战这些卫士；他甚至准备公开抗辩圣·贝尔纳。尽管对此类抗辩他信心十足，况且他自己在聪明才智上比这位伟大的院长也更胜一筹，但由于政治力量上与圣·贝尔纳的悬殊，所以他感到爱莫能助。

他从来就没有机会与圣·贝尔纳对质，否则他就能用自己的武器与之对抗。计划辩论的头一晚，贝尔纳将主教们召集起来，并发给他们一份文件，宣称阿伯拉尔是危险的异教徒。这么一来，他便巧妙地将一场辩论转为一次审讯，让阿伯拉尔不得不证明自己的清白。此刻，阿伯拉尔能做的就是对贝尔纳安排的辩论会提出异议，并直接向教皇上诉。结果，主教们对这个被指控为异教徒的人作出了温和的判决，并将该案提交罗马。贝尔纳知道了此事，于是插手干预，并有力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这场“争辩”以阿伯拉尔被教皇定罪而告终，而他的书籍也在圣彼得教堂被烧毁。之后，阿伯拉尔到克鲁尼寻求庇护，在那里他受到了修道院长彼得尊者的盛情款待。这位院长后来成功地撤销了罗马将阿伯拉尔逐出教会的判决，甚至调和了阿伯拉尔与贝尔纳的关系。阿伯拉尔最后死于索恩河畔夏龙市圣马赛尔（St.Marcel）修道院。

阿伯拉尔与贝尔纳之间的分歧可看作是更广泛冲突的代表。这是理解与信仰，理性与权威，科学与教会之间长期斗争的早期小冲突。这场斗争始于中世纪鼎盛时代，一直到18世纪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将神学从世界知识中分离出来时才得以解决，阿伯拉尔被颇有影响力的院长打败了，而最重要的是，这场辩论发生的方式表现了权力的显著失衡，而这种失衡直到近代才开始改变。伽利略（1564—1642年）便是一个例子。他因拥护哥白尼理论而遭受宗教审判，然后让他公开否认这一理论。这表明思想解放的过程是何等的漫长。

13世纪，大学成为城镇的新兴力量，经院哲学达到了鼎盛，而科学（在初期仍缺乏方法和客观性）尚不能从基督教教义中解放出来，向世人揭示一个崭新的世界。雅克·勒戈夫在其著作《中世纪时代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 in the Middle Ages*）（1957年）中简要描绘了早期大学兴起的情况。他们必须维护自己的权利，起初是与教会力量尤其是与当地主教斗争，后来又与世俗力量尤其是皇室斗争，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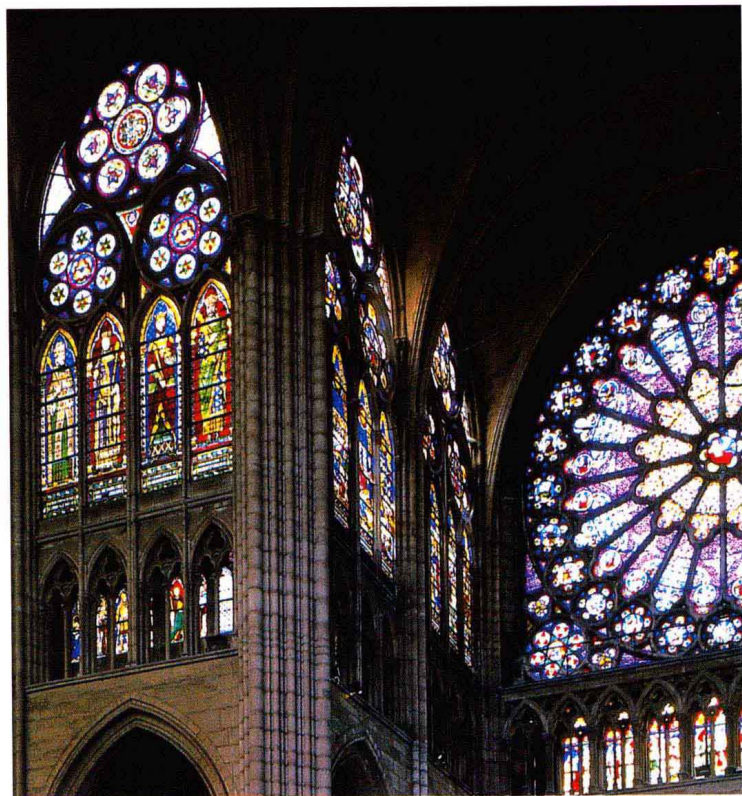
那时他们的同盟者是教皇。最后一阶段便是从教皇统治中赢得意义深远的独立。在中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教会压制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从而维系了其几个世纪的地位和权力。

## 解读哥特式教堂的方法

上面简单介绍了哥特式建筑的文化和历史背景。长期以来，哥特式建筑的研究却很少关注这些内容。

在浪漫主义者采用哥特式风格之后，受维奥莱·勒公爵的《法国建筑辞典》(*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 l'architecture française*) (1854—1868年) 启发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解读。《法国建筑辞典》从结构和技术的角度（即在19世纪钢结构发展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解读方法）考察了哥特式大教堂的发展。实质上，此方法就是从工程师的视角看哥特式建筑。虽然人们并未通过它创造出与扬岑的“精致墙壁”或泽德尔迈尔的“华盖系统”一样精炼的解读概念，但20世纪的几位作家（特别是维克托·萨布雷(Victor Sabouret)和波尔·亚伯拉罕(Pol Abraham)) 弘扬了这一解读方法。学者奥托·冯·西姆松(Otto von Simson) 继承了扬岑和泽德尔迈尔正统的分析解释传统。弗朗茨·库格勒(Franz Kugler) 凭借其哥特式大教堂的研究著作《艺术史手册》(*Handbook of Art History*) (1842年) 和《建筑史》(*History of Architecture*) (1856—1859年) 开这一先河。然而，更重要的是冯·西姆松还借鉴了帕诺夫斯基从思想史的角度解读哥特式。帕诺夫斯基曾于1946年就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的关系发表了演说。他介绍了修道院长叙热如何看待光在新教堂中所发挥的作用。冯·西姆松则从此话题谈起，着重强调在哥特式大教堂发展方面，光的精神理念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1956年，他拓展了自己的想法，并发表了《哥特式大教堂：哥特式建筑建筑之起源与中世纪的柱式理念》(*The Gothic Cathedral: Origins of Gothic Architecture and the Medieval Concept of Order*)，以此作为对泽德尔迈尔的《大教堂的出现》的回应。此后，人们曾作过许多努力，解释那些透过彩色玻璃窗的光线在大教堂修建中的确切意义，而所有此类解释都源自叙热本人所作的评述。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迈克尔·卡米尔(Michael Camille) 的《哥特艺术》(*Gothic Art*) (1996年) 中“神圣之光”("Heavenly Light") 章节。

修道院院长叙热曾在其两本短篇作品中介绍了修道院教堂的重建。这两本书分别为《圣丹尼斯教堂献祭仪式掠影》(*Libellus de Consecratione Ecclesiae Sancti Dionysii*) 和《斯人有待负责完成的工作》(*De Rebus in Administratione sua Gestis*)，写于1145—1150



年间，证明他的教堂项目是上帝满意的工程。正是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叙热提出了光的特殊重要性，将物质中产生的美（窗户和宝石折射的光辉）提升到精神（上帝之光）层面。叙热谈到了神奇之光(*lux mirabilis*) 与最圣洁的窗户(*sacratissimae vitrae*)。帕诺夫斯基认为可根据新柏拉图哲学对光的理解来解释叙热的这两部作品和他的其他论著。很明显，这种方法为冯·西姆松阐释“光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light*)”奠定了基础。几位艺术史学家继承了他的衣钵。但近几年，从冯·西姆松得出的其他结论的不足之处来看，他对此问题的看法已经失去了许多说服力。

因而，比如京特·宾丁(Günther Binding) 在其论文《新哥特风格：合理性与错觉》(*The New Cathedral: Rationality and Illusion*) (1995年) 中认真研究了中世纪的修建通常做法：

“将哥特式建筑理解为对一种超自然力量存在的反应，或更准确地说，对一种超自然力量存在的体现。”此外，他既不赞同冯·西姆松所认为的叙热力图“将朝拜者引向新的圣地，继而让他们感受到叙热自己从艺术中获得的宗教体验”；也不同意他所声称的“叙热的教堂

多梅尼科·伦齐 (Domenico Lenzi)

《玉米市场》，伊利·比亚戴欧罗 (Il Biadaio) 绘画  
14世纪

佛罗伦萨劳伦佐图书馆 (Biblioteca Laurenziana)

设计，即哥特风格的创造，源于那种（宗教）体验。”宾丁认为，上述错误理解的根源在于冯·西姆松及前辈帕诺夫斯基，二人采纳的论据均属于断章取义，或本身就以一种错误的或至少是带偏见的方式来解读这些原始资料。宾丁指出，早在叙热之前，《圣经》所述的建筑物——诺亚方舟 (Noah's ark)、摩西 (Moses) 神堂、所罗门 (Solomon) 神殿、伊齐基尔 (Ezekiel) 想象的天堂，以及世界末日 (Apocalypse) 的新耶路撒冷 (New Jerusalem) ——已经具有中世纪资助人的象征价值，他总结说“奥托·冯·西姆松所选择运用的原始资料不能建立新式大教堂（即圣丹尼斯的哥特式唱诗堂）的‘理论’。它们既没有创造也没有建立哥特式大教堂，却被明确地归为学术学科和神学范畴，并采用12世纪之前的传统方法加以解读。埃尔温·帕诺夫斯基尝试……确定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之间的相似性，也属于这种情况。”

对宾丁而言，大教堂“是庆祝神圣主显节和举行常规仪式首选的最佳场所。”他认为1190年至1235年间出现的建筑构造的改变“有赖于12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发展，还依靠经济发展产生的大批熟练且可发挥作用的工人。”然而，宾丁并未将自己的思路局限于经济和技术条件，因为他用了这样一句话作为他的分析总结：新教堂的哥特元素是“建筑、想象、理性和神学巧妙而和谐的融合”。

## 哥特式建筑出现的社会和经济背景

法国历史学家乔治·达比 (Georges Duby) 在其著作《大教堂时代》(The Age of the Cathedrals) 中《上帝即光》(God is Light) 章节，将叙热的建筑视为修道院院长的“应用神学的里程碑”。他认为叙热所创造的新建筑是一支赞美上帝之子的圣歌。书里，他提出了一套全面解读哥特式大教堂的方法。而这本著作实质上是一部关于艺术创作的历史社会学，旨在将大教堂明确限定在其特殊的社会和思想大环境中加以讨论。我们已看到12世纪的城镇发展成为艺术中心，而就在那里，哥特文化得以生根发芽。哥特式大教堂是这种新兴城市文化最高成就的一部分，而13世纪的大学则是城市文化最重要的机构。

迪比正是在上述城市复兴的大背景下审视大教堂的艺术：“整个12世纪和13世纪中，（城镇）不仅规模扩大而且更富有生机，同时城市边缘的街区也沿着道路向外扩张。它们是吸引财富的天然磁石。经历了长时间无人问津的状态后，那些城市成为重要的阿尔卑斯 (Alps) 北部的中心，具有最先进的文化。然而，城市的所有活力都来自周围的乡村，而且只是暂时的。当时，多数庄园主决定从他们的住处迁往城市。因而，他们土地所生产的产品也随之涌向城市。在那些城市中，

最活跃的商品是小麦、红酒和羊毛制品。因此，尽管大教堂艺术是城市艺术，它仍旧依赖附近的农村作为主要因素推动其发展，正是土地开垦者、蔓藤植物的种植者、沟渠的挖掘工、堤防的建造者等无数先驱的努力和农业的兴旺共同成就了大教堂艺术。”

迪比提醒我们新式大教堂诞生于“人的神圣理想仍旧是修道理想，而且未来亦是如此”的社会，圣·贝尔纳的强烈个性和西多会的势力便是明证。在许多方面，西多会仍代表基于土地所有制的旧农村修会。除西多会以外，13世纪头三十几年里还出现了两个托钵修会——方济各会 (Franciscans) 和多米我会 (Dominicans)。

托钵修会作为新型修会的出现，完全不同于修道院的老群体，或大教堂或神学院的圣堂参事会；其成员必然履行他们发誓遵循的生活准则，而不是某种特殊的修道生活。这种新修会不仅要求每位修士发誓安贫守道一生，而且要求他们在修道生活中不得拥有任何物质



圣·吉米尼亚诺 (San Gimignano) (意大利托斯卡纳区)  
不同人家的塔楼  
建于归尔甫派与吉柏林派 (Guelph Ghibelline) 冲突时期  
约1300年

财富。该修会的(男)成员将他们的时间都花在工作、学习和精神援助上,同时以乞讨施舍物为生。作为托钵修会和劝诫修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集中在城市。13世纪,托钵修会的各大教堂,简朴至极,通常是厅堂式教堂,并以哥特式为主要风格。这些没有侧堂的教堂旨在拥有尽可能多的会众,因为训诫是托钵僧行使其天职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教会对中世纪城市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见243页)。此外,这些托钵修会在与众多异教宗派斗争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正统的基督教的角度来看,最大的危险来自在法国南部迅速扩张的卡塔尔派(Cathars)(见116—117页)。在卡塔尔教徒聚居的朗格多克(Languedoc),圣·贝尔纳企图说服这些异教徒改变他们的信仰,然而这一想法完全落空了。之后,他在西多会的协助下多次尝试通过武力改变他们的信仰。而多明我会传教士则首先努力采用劝说而非武力手段。用迪比的话说,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懂得如何让最

安德烈亚·达·菲伦泽 (Andrea da Firenze)

《多明我会寓言》(Allegory of the Dominican Order), 1366—1368年

讲道场景局部

佛罗伦萨圣母玛利亚教堂

西班牙人礼拜堂 (Cappella degli Spagnuoli)



大范围的大众倾听他们的布道”。他们就人们最敏感的话题用日常的通俗语言进行讲解,而避免使用抽象的概念,同时利用引人注目的图画帮助理解。讲经时,他们根据其听众的社会地位,掺杂了各式各样的轶事奇闻。通过第一部圣迹剧的表演,他们与传道总会联合,开始运用戏剧演出的感召力。尽管艺术至此已成为一种祈祷和表达敬意的形式,以颂扬神之荣光,但急于说服世人并使其皈依的新兴修会将艺术用作彻底感化芸芸众生的一种手段。”

因而,难怪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这两派为了最有效的传教方式而经常争论不休,最终在哲学和神学的争辩中以及为教会内部影响力的斗争的过程中相互利用,并且二者在绘画发展和哲学与神学教学方面起到了革新作用。中世纪一些最伟大的哲学家就来自多明我会(阿尔贝图斯·马格努斯(Albertus Magnus)、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或方济各会(圣波拿文都拉(Bonaventura)、邓斯·斯科特斯(Duns Scotus)),但由于多明我会的发展与罗马教会密切相关,因而他们赞同用圣战捍卫基督教正统。他们不回避使用武力。作为“实施审判”的宗教法庭的主要代理人,他们应对中世纪教会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负责。

有关哥特式艺术和建筑的最新著作(法语和德语)有:阿兰·埃兰登·布兰登堡(Alain Erlande Brandenburg)的《哥特式艺术》(Gothic Art)(1983年)、迪特尔·坎佩尔(Dieter Kimpel)和罗伯特·萨卡卡尔(Robert Suckale)的《法国的哥特式建筑》(Gothic Architecture in France, 1130—1270年)(1985年)、维利巴尔德·绍



尔兰特尔 (Willibald Sauerländer) 的《大教堂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Great Cathedrals* 1140—1260年) (1990年)、阿兰·埃尔兰德·布兰登堡《哥特的胜利》(*Triumph of Gothic* 1260—1380) (1988年)、阿尔贝·沙特莱 (Albert Châtelet) 和罗兰·雷希特 (Roland Recht) 《中世纪之末》(*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 1380—1500) (1988年) 以及上文提到过的京特·宾丁和迈克尔·卡米尔的著作, 等等。当然, 所有上述著作均以针对形式分析思想史、肖像学以及经济和社会史的大量研究为基础。这正是他们比过去著作强的地方。然而, 鉴于专业性研究数量与日俱增, 新的研究越来越难以对本书所述类型的哥特式艺术和建筑进行新的总结。

对于上述著作, 我们只简要介绍其中一本着重于哥特式建筑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作品:

坎佩尔和萨克卡尔的《1130—1270年间法国的哥特式建筑》堪称是有关法国早期和盛期哥特式建筑的经典之作。两位作者的论点是“哥特式发源地以及在1200年之前哥特式影响之处完全位于法国皇室统治的疆域。直到1270年, 法兰西疆土上的共济会才成为真正的变革中心。”他们写道, “哥特式风格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具有动态特征”, 因而指出, 他们认为政治和经济因素在哥特式的兴起和发展进程中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在院长叙热记述他的修建工作的流水帐式作品中, 前25章正是采用的这一典型解读方法, 其中提到了至今仍被大多数艺术史学家忽视的建筑项目的若干历史和经济因素。(见28页)

坎佩尔和萨克卡尔采用的方法具有多面性, 在他们的第一章中明确体现出来了这一点。其中, 他们将亚眠 (Amiens) 大教堂用作“研究哥特式大教堂的引子。”除了建筑史和形式与功能的详细说明以外, 他们试图重现建筑的原始风貌, 考察建筑工程的早期情况, 以及探讨建筑资助人以及建筑功能。

为此, 他们分析了主教 (首先倡导新建筑的人)、教堂的牧师会、民众 (公民) 和国王 (其他建造者) 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并考虑到了在新建大教堂中他们各自起到的作用。简言之, 他们将政治和建筑工程看作是国王、主教和民众共同利益推动的结果, 即, “压制封建贵族的专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典型的合作, 也是这种合作决定了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建筑。对主要建造者、石匠及其工具和工棚、建筑师的建筑知识等的进一步详细研究加深了我们的印象, 即两位作者实际上是在说明大教堂修建时的社会和经济因素。虽然我们不可否认他们具有思想意识上的局限性, 但20世纪80年代初期确

有必要强调中世纪建筑的上述因素。与此同时, 他们也关注形式、美学和肖像学等因素。对于人们长期争议不休的问题: 修建大教堂, 建筑技术和“思想”哪个更重要, 两位作者采取了中立的态度。“我们想公开承认我们认为没有技术创新和建筑创新就没有哥特式的出现; 但我们决不认为哥特式建筑仅仅是工程技术的雏形。只有从美学、建筑、政治、宗教、经济 and 思潮的辩证关系来看, 才能完全理解哥特式。”

这一多面性方法也是本书所采用的方法。

本卷并未讨论任何“辩证学”, 以及所采用的视角与坎佩尔和萨克卡尔的相反, 并再次义无反顾地转向形式比较分析。这正反映了艺术史上的风格变化。

## 哥特式与文艺复兴

“13世纪的哥特式大教堂与12世纪的罗马式建筑在许多方面迥异: 尖拱取代圆拱, 扶壁取代土墙, 空间分明的薄墙取代设有窗户的厚墙, 网眼窗格取代梯级式或壁龛式表面。最重要的是创造了统一的空间, 而非仅仅按照当时的惯常做法增加空间单元。”京特·宾丁详细描述了这些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元素, 共同构成了中世纪石工的全部内容, 其中包括建筑外观突破性元素, 比如三角墙、小尖塔、尖顶和卷叶饰。(凡属于哥特式大教堂术语的上述元素及其他元素, 读者可参见18—27页。凡在18—27页未作解释的术语, 可参见附录“术语表”。)

对于哥特式大教堂与其他哥特式教堂 (比如, 具有部分哥特风格特征的西多会修道院、托钵修会教堂、普瓦图 (Poitou) 的哥特风格厅堂式教堂) 的关系问题, 泽德尔迈尔已说明它们采用哥特式“形态”可追溯到它们跟哥特式教堂的冲突。“与哥特式大教堂相比, 这些‘哥特式’的确吸纳了个别的哥特样式: 尖拱、拱顶形状、集柱、玫瑰花窗以及唱诗堂里辐射状小教堂, 但上述样式在其新环境中每次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因此, 这里的‘哥特式’不是指产生哥特式大教堂的哥特式, 而是指产生‘哥特式’的大教堂。”

讨论完哥特式起源之后, 我们将简单介绍哥特式与文艺复兴的关系, 从而加以归纳总结。因为确定哥特式出现于中世纪末, 而文艺复兴出现在近代之初, 所以难怪人们对这两段时期的确切分水岭众说纷纭。争论的焦点曾经是 (现在仍是) 文艺复兴的概念, 因为根据文艺复兴的具体概念得出的过渡时间站不住脚。“新时代的界限曾经似乎长期一直跟1500年左右的伟大发现时代联系在一起。在此之后, 经过不断深入具体细节研究, 历史和文学研究领域最终爆发了一场温和的‘中